

浙江古寺寻踪

郭学焕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文史丛书之四十三

浙江古寺寻迹

郭学焕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浙江古寺寻迹 / 郭学焕著.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540-1260-4

I. ①浙… II. ①郭… III. ①寺庙—介绍—浙江
IV. ①K9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4353 号

浙江古寺寻迹

郭学焕 著

-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电话: 0571-85068292)
- 责任编辑 陈临士
- 文字编辑 张 莹
- 责任校对 余 宏
- 封面设计 徐然然
- 封面题字 金鉴才
- 责任印务 楼浩凯
- 照 排 杭州享尔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 印 刷 浙江国广彩印有限公司
-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 印 张 26.5
- 字 数 460千
-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 印 次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 书 号 978-7-5540-1260-4
- 定 价 48.00元
- 网 址 www.zjguji.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佛教寺院是佛教僧人聚居及开展佛教活动的场所，既是佛教最重要的文化标志，更是佛教文化流传的空间载体。寺院文化本身承载着佛教文化的历史变迁，寺院的历史本身甚至就是佛教中国化进程的历史写照。相传汉明帝在洛阳创立白马寺，为我国佛教寺院之始，至今已有 2000 多年历史。早期的佛教寺院，多以舍宅为寺。隋唐以后，佛教寺院创建越来越普遍。浙江历史上的大多数佛教寺院皆兴建于这一时期。浙江佛教寺院之“古”，盖源于此也。

“古寺”，不仅特指佛教历史意义上的“古老寺院”，同时也是一种深植于历史长河中的“文化意象”，并在广大民众中具有普遍影响的“历史记忆”与独特的“文化符号”“文化景观”。因此，“古寺”也是一种具有中国元素的“文化现象”。对于作为具有中国文化元素特色的众多“古寺”，我们或许会记起宋徽宗赵佶著名的“深山藏古寺”，也会想到唐代诗人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中所吟诵的“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通过文人入诗、墨客入画，“古寺”渐成为一道文化记忆的风景线，甚至于衍化成“天下名山古寺多”的景观常态。郭学焕先生的新著《浙江古寺寻迹》，通过持续四年探寻浙江大地上的“古寺文化”，深入文献及实地考察，充分挖掘“浙江古寺”所深蕴的历史积淀，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多维度地呈现“浙江古寺”

鲜活的当代景观。这部通古贯今的《浙江古寺寻迹》，既引人探寻浙江寺院的“历史之古”，更让人领略浙江佛教的“文化之厚”。

对于“浙江古寺”的探踪寻迹，可谓是100多年来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并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近代浙江佛教的人文地理或文化地理的内容。早在1912年，江苏佛教居士高鹤年先生（1872—1962，江苏兴化人）在上海《佛学丛报》第3期“文苑”栏目开始连载《名山游访记》，1935年首次结集出版，至1948年补编再版，短短十余年间，竟先后印刷了六次，成为民国时期佛教纪游文学中的经典之作。1956年，此书又增加了“外编”“增编”2万余字，始成“定本”。《名山游访记》记述了当时浙江湖州、杭州、台州、温州、宁波、普陀山等处的诸多“古寺”，为后人存留了许多珍贵的浙江佛教景观，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1918年至1924年，日本佛教学者常盘大定（1870—1945）、关野贞（1868—1935）组织田野调查团，亦曾在浙江从事佛教文化史迹调查工作。通过照片、图解和文字并用，记录了杭州雷峰塔、保俶塔、灵隐寺、净慈寺、天竺寺、凤林寺、昭庆律寺、高丽寺、圣水寺、玛瑙寺、梵天讲寺、闸口白塔、六和塔、云栖寺、孝义庵太素锦庵塔、飞来峰、径山寺；宁波延庆寺、宝云寺、天封塔、天宁寺、岳林寺、雪窦寺、天童寺、阿育王寺；普陀山潮音洞、磐陀石、太子塔、普济寺、法雨寺；绍兴大善寺、塔山等风貌。1934年5、6月间，日本禅宗学者铃木大拙（1870—1966）来到中国，撰写了《中国佛教印象记》，亦曾寻访杭州净慈寺、昭庆寺、灵隐寺、上天竺寺、清涟寺、紫竹林寺及宁波天童寺、七塔寺和普陀山等佛刹，考察并记录了当时浙江佛教现状。《浙江古寺寻迹》则是当代浙江钟情于传统文化的有识之士专门记录佛教寺院文化的一部最新力作，视野开阔，内容翔实，笔触鲜活，时代感强，展现了“浙山浙水”“浙寺浙僧”的人文图景与生活场景。

佛教传入浙江后，得到迅速发展，佛教对浙江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浙江历史上高僧辈出，形成了独特的江南佛教风格。浙江佛教在对外交流中贡献突出，尤其与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佛教发展关系密切。历史上曾以“深山藏古寺”而著称于世的“诗画浙江”有着众多的“佛教（寺院）元素”，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先行地，在加快建设“诗画浙江”的新时代进程中，当代“生态佛教（寺院）元素”亦不应缺席。

2017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加强历史研究和传承，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2018年5月13日，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再次谈到学习历史文化的重要性：“……从历史中汲取更多精神营养。要加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让优秀文物世代相传。”

《浙江古寺寻迹》正是一幅通过“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而徐徐展开的浙江寺院文化长卷。

“让文物说话”。《浙江古寺寻迹》特别突出浙江寺院“文物属性”，全面检录了浙江佛教寺院中先后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者41处，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者35处，涉及建筑、经幢、佛教类古塔、摩崖石刻、遗址等，两者共计76处“重点文物”，可见“浙江古寺”的分量之重。“让文物说话”，充分展现了浙江寺院文化的历史底蕴。

“让历史说话”。一部寺院史，既是一部佛教文化史、佛教社会史，同时也是一部以僧人活动为主体的佛教生活史。《浙江古寺寻迹》全书分六篇：“五大佛教名山”“全国重点寺院”“省重点寺院”“其他古寺文物”“文物专记”和“其他”，共计45篇文章，涉及古寺近百座，内容虽有详略，但大的行政区划无一遗漏，较好地体现了本书撰著过程中的平衡性考量。此番用意，难能可贵。

当然，本书更突出“重点”，即更多关注浙江省内的重点寺院。众所周知，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将逐步开放的汉传佛教寺院划分为全国重点寺院等不同类型。1983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确定汉族地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观的报告》，公布了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名单（共142座）。其中，浙江省共有杭州市灵隐寺、净慈寺，宁波市七塔寺、天童寺、阿育王寺，绍兴新昌大佛寺，普陀山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台州天台国清寺（包括智者塔院）、高明寺、方广寺，温州江心寺等13座全国重点寺院。显然，上述这些唯一的一批全国重点寺院，自是广大普通读者更为关心、更感兴趣的对象，同时也是我省知名度最高、在民众中影响力最广的佛教寺院。除了全国重点寺院之外，本书还把26座省重点寺院纳入视野，较好地充实了本书的内容。

有寺当有僧。寺由僧立，寺因僧兴。寺僧一体，是佛教活动的基本形态，也是传统寺院生活及其内在管理的一大规范。浙江寺院亦不例外。就佛教文化而言，吴越国主钱镠建都杭州，弘扬佛法，奠定了浙江作为“东南佛国”的基础。南宋所谓禅宗“五山十刹”，也以浙江寺院居多。元代在杭州设有行宣政院，管理南方佛教事务，更进一步确立江南佛教中心的历史地位。明清时期，佛教广泛渗透于民众生活之中，其文化影响更具大众化，其表现样式更具多元化，影响至今。《浙江古寺寻迹》颇为审慎地处理寺院与僧人的关系，特别是名刹与名僧的关系，以其独特的“以寺记僧”“因僧显寺”的写作手法，将古寺与名僧圆满地结合起来，突出了名寺、名僧的历史联结。

“让文化说话”。佛教寺院曾是不同历史时期当地文化的重要载体，许多寺庙都与

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联。佛教史有一句许多人耳熟能详的“名言”，称“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虚行，遇缘则应”。佛教文化的理论核心是“因缘论”。浙江作为人文荟萃之地、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聚集之域，如何彰显佛教寺院的地方人文特色，突出其“名城之缘”“历史之缘”“文化之缘”，最终为“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人文浙江”服务。这既是本书作者探寻浙江古寺历史文化的人文情怀之所系，也将吸引更多的目光来关注浙江佛教历史文化如何适应社会、融入时代、服务大众的的现实努力。

正如浙江佛教最能体现独特的“江南佛教风格”一样，浙江古寺文化同样具有浓郁的江南文化特色。本书博征文献，考诸实迹，遍访高贤，聚焦于名士、名僧、名寺、名诗等所呈现的古寺文脉，使全书的文字既具很强的可读性，也有着相当形象化的图景感，让人能够真切地领略到通古贯今、鉴古知今之风貌，融古今人文为一体，藉寺观文，因文见寺。

本人承蒙著者信任，有幸提前通读全书，获益良多。聊述拙见，权作为序。

陈永革

2018年6月18日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灿烂辉煌。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同时，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发展，取得了重大成效，进一步增强了我国各族人民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便与华夏文化相交融，经过 2000 多年的发展，尤其是隋唐以后，逐步形成了中国汉族地区佛教。中国汉地佛教，是中华民族灿烂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佛教寺院文化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佛教寺院中的殿堂、佛塔等建筑，铭刻、雕塑、绘画、书法、楹联、诗词等艺术作品，皆反映了佛教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自古国运昌盛，则佛教兴。当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新中国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国泰民安。在党的宗教政策指引下，我国汉族地区佛教适应社会，爱国爱教，依法得到健康的延续和发展，佛教文化和文物古迹也得到了良好的传承和保护。

浙江素有“文化之邦”之称，浙江的古寺众多，佛教文化底蕴深厚，特点明显。

一是历史悠久。浙江域内众多古寺中，千年古刹就有 100 余座。早在东吴时期就有佛教传入浙江，距今已逾 1800 年。有的古刹传承延续至今而未有中断，如宁波天童寺，自西晋永康元年（300）建寺以来，历 182 位住持相传不辍。同时，历史上的不同

时期，浙江形成了“三个佛国”：吴越时期“东南佛国”；隋朝随着天台宗的形成，宁波、台州被称为“江东佛国”；明清时期普陀山观音道场形成，称“海天佛国”。当年南宋宁宗敕定的江南禅院“五山十刹”，其中“五山”全在浙江，它们是径山寺、灵隐寺、天童寺、净慈寺、阿育王寺。“十刹”为中天竺寺、万寿寺、灵谷寺（江苏）、报因寺（江苏）、雪窦寺、江心寺、雪峰寺（福建）、双林寺、云岩寺（福建）、国清寺，其中浙江有6座。

二是道场多、宗庭多。浙江佛教一般称有四大道场：普陀山的观音道场、奉化雪窦山弥勒道场、天目山的韦陀道场、天台山的罗汉道场。宗庭多，我国佛教主要形成八宗：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禅宗后来又分为诸多宗派，其中有临济宗、曹洞宗两派流传不绝，浙江的天台国清寺是天台宗祖庭、宁波天童寺是日本曹洞宗祖庭、绍兴嘉祥寺是三论宗祖庭、余杭径山寺是临济宗中兴祖庭等。

三是高僧多。其中，有开宗派、创流派的高僧天台宗智者大师、三论宗吉藏、律宗道宣、曹洞宗良价、默照禅宏智正觉、临济宗法钦、看话禅大慧宗杲、三教合一的契嵩、号称“大士”的傅大士以及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云栖株宏等；有重大佛学著作和弘扬佛法具重大影响的高僧智者、永明延寿、宝志、永嘉大师、贯休、寒山、拾得、契此、僧佑、藕益、印光、弘一、谛闲、太虚等。还有，民国时期曾推举为中华佛教总会会长的诗僧敬安、1929年开始连任七届会长的圆瑛，以及1957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1962年当选中国佛协名誉会长的应慈。

四是涉佛文物古迹多。浙江有众多历史悠久的寺院古建筑及经幢、佛像、古塔、摩崖石刻、遗址等，其中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1处、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5处。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接受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思想的熏陶和教育，热爱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佛教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浙江佛教的沿革过程中，古寺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窃以为值得记写。同时记写浙江佛教古寺也是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文化浙江、促进浙江旅游事业和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2013年，完成《孔子后裔在浙江》一书的撰写并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我便开始着手撰写《浙江古寺寻迹》，试介绍浙江佛教古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同全国一样，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传统佛教依法得到健康发展。2006年4月13日至18日，首届世界佛教论坛由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与中国佛教协会联合主办，在中国浙江——杭州·舟山举办，共有3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学术界、企业界、文艺界、政界等代表达1000余人出席。

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不少重视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指出：“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接受国家依法管理；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更增强了我写作的信心。

我走访古寺，搜集、阅读资料，并着手写作，历时4年。其间，我把想法向浙江省民宗委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他们的赞同和支持。我还拜访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浙江宗教研究中心主任陈永革先生，得到了他的指导、帮助并为本书作《序》。著名书画家金鉴才先生还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浙江古寺很多，超过千年历史的就有100余座，我的能力有限，无法一一记写，于是我确定了“两必写、一部分”的原则。

“两必写”：一是我省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13座（杭州的灵隐寺、净慈寺，宁波的七塔禅寺、天童寺、阿育王寺，绍兴新昌大佛寺，舟山普陀山的普济禅寺、法雨寺、慧济禅寺，台州的国清寺与智者塔院、高明讲寺、方广寺，温州的江心寺）和省级佛教重点开放寺院26座必写；二是涉佛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1处和省文物保护单位35处必写。

“一部分”，即部分高僧。在记写古寺的同时，“以寺记僧”，重点记述一部分高僧。历史上浙江高僧甚众，于是列出了重点记写的四条要求：一是开宗派、创流派的；二是有重大著作、弘扬佛法有重大贡献的；三是担任过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以上的；四是民国时期及以前的。

根据上述“两必写、一部分”的基本原则，我考察古寺名刹、拜访住持寺僧、搜集志书资料，四年里我跑遍了所有浙江省域内的全国、省重点寺院，地处浙江的江南禅院“五山十刹”，以及大部分涉佛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对省内如杭州、宁波、温州、台州古寺较多的地市，考察皆达三次以上。而且每访一处尽可能把情况了解清楚，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乐此不疲。

在寻访、考察和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了省民宗委、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及有关市、县民宗局、文物部门的支持；佛教协会及各地寺院为我提供帮助，寺院住持、寺僧给我作介绍并提供资料；当然，也得到我原来工作的交通系统同仁的大力帮助，让我能顺利完成寻访、搜集资料和撰写。

浙江古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撰写时我要求自己，一是要尊重史实，如实记写，有时为了弄清楚一件事，会查找几处史料，以互相印证。遇到个别史料上有不同记述，无法确认时，我便把不同之处一并列记，让读者和历史再作验证。二是一定要到实地寻迹、考察，走访当地、当事人，听取他们的介绍，从中了解情况，寻找史料，体悟现场的感受，以丰富内容。

由于本人对佛教和佛学的了解和知识不足，撰写时除阅读寺院提供的志书、资料外，我还搜集和查阅了大量有关书籍和信息，如《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禅宗大词典》等，有时为了撰写一篇文章得阅读数万字的文字资料。

全书文稿 45 篇，目录分列为六篇：第一篇“五大佛教名山”，列我省的观音道场普陀山和弥勒道场雪窦山；第二篇“全国重点寺院”，按照国家公布的顺序列文；第三篇“省重点寺院”，按照省公布的顺序列文；第四篇“其他古寺、文物”；第五篇“文物专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文物保护单位除随文、随寺记入以外，专门记写了 6 篇文章；第六篇“其他”，记写《高僧传》的浙江缘。

文章初稿形成后，我一一寄给相关寺院及有关地方的佛教协会，请他们帮助修改补充。同时，我还请我的老同事、老同学吕新龙、王彬、杨仲坚、沈文华等分别帮助阅改文稿。

在此我要对所有为成书而提供帮助、支持的省市县有关部门领导、工作人员；佛教界各位法师、老师；各位同事、同仁、朋友和我妻孙满琴表示深深的感谢！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佛教和古寺历史悠久、内涵深邃，由于本人知识浅薄，水平有限，文中难免有遗漏、不足，甚至谬误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18 年 6 月于杭州宝石斋

第一篇 五大佛教名山

观音道场普陀山 / 002

弥勒道场雪窦山 / 016

第二篇 全国重点寺院

杭州灵隐寺 / 031

《灵隐寺志》及编撰者 / 039

添色湖山数净慈 / 046

古朴典雅七塔寺 / 061

十方丛林天童寺 / 071

阿育王寺和舍利塔 / 080

新昌大佛寺 / 091

天台宗祖庭国清寺 / 099

高明古刹钟声远 / 110

飞瀑石梁方广寺 / 118

江天福地江心寺 / 122

第三篇 省重点寺院

“五山之首” 余杭径山万寿禅寺 / 130

临安西天目禅源寺 / 141

两访慈溪五磊讲寺 / 151

访宁波福泉寺、龙泉寺和宝陀寺 / 155

寻迹温州圣寿寺和头陀寺 / 165

温州妙果寺和法华寺 / 171

台州多宝讲寺、华顶讲寺和万年寺 / 176

访善法寺、明因讲寺和清修寺 / 186

寻访湖州法华寺和万寿寺 / 194

灵峰寺、寿圣寺和慈云寺访迹 / 202

登白露山访慧教禅寺 / 210

嘉兴福严寺和觉海寺 / 214

舟山定海祖印寺 / 218

第四篇 其他古寺、文物

林谷深藏天竺寺 / 223

东南佛国名寺遗事 / 235

访嘉兴唐代经幢及古寺 / 245

东吴古刹金粟寺 / 256

会稽山下访古寺 / 265

西施故里五洩禅寺 / 278

义乌双林寺和傅大士 / 289

寻迹金华古寺 / 297

龙游的古塔古寺 / 312

三衢道中有古刹 / 320

万顷碧波映古刹 / 334

秀山丽水古寺塔 / 342

第五篇 文物专记

杭州佛教文物记略 / 353

灵山毓秀保国寺 / 362

甬城唐、宋两古塔 / 369

数点金甌寺塔文物 / 372

武义元刹延福寺 / 380

佛教类国保、省保补记 / 387

第六篇 其他

《高僧传》的浙江缘 / 399

参考文献

第一篇

五大佛教名山

观音道场普陀山

在我国的东海之滨，有一个神奇而美丽的小岛，像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镶嵌在万顷碧波间，她就是普陀山。普陀山是我国佛教圣地，与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和奉化雪窦山并称为“佛教五大名山”。普陀山为观世音宣化道场，素有“海天佛国”之称。

普陀山是浙江舟山群岛诸岛之一，与舟山沈家门渔港隔海相望。岛南北长约 8.6 公里，东西宽约 3.5 公里，面积 12.5 平方公里。也许是岛上奇石嶙峋、古木葱茏，岛周或峭壁临海，或金沙迎浪，是气候冬暖夏凉的清佳之境；也许是岛上有古寺晨钟暮鼓，梵音悠悠，是香烟缭绕的佛国梵地，千百年来，普陀山吸引着众多佛家信众、旅游观光者纷至沓来。据称，如今进出普陀山的旅客每年逾千万人次。

（一）

普陀山古称补陀洛迦山，系梵语音译，意为“美丽的小白花”。普陀山又名梅岑，古代就成了道人修炼之地。历代文人雅士来到这里，留下了诸多题咏。王安石有《洛迦题咏》，曰：“山势欲压海，禅宫向此开。鱼龙腥不到，日月影先来。树色秋擎出，钟声浪答回。何期乘吏役，暂此拂尘埃。”

晋太康年间（280—289），信徒们已发现普陀山自然环境与佛教诸经所载观音圣地相似，时有人登山求访大士踪迹。唐咸通四年（863）春，日本天台宗始祖最澄之高足慧锇，在五台山请得观音圣像一尊，负至明州（今宁波）开元寺，四月随张友信便船归国，途经梅岑山（普陀山）潮音洞附近，遭遇风浪，舟不能行进，夜得一梦，有僧对他说“汝但安吾此山，必令便风相送”。于是他便把观音像留在潮音洞侧，祈拜而去。当地一位张氏居民请观音像供于庵内，世称“不肯去观音”。

直到后梁贞明二年（916），地方官府在张宅故址上建“不肯去观音院”。宋元丰三